

研究論文

從「工人文化」到「公共文化」： 工人文化宮國家記憶之流變(1949-2015)

路淼

摘要

工人文化宮是中國工人階級重要的「記憶場所」。基於對《人民日報》及相關政策文件的話語分析，本研究追溯了國家在不同歷史時期所建構的文化宮記憶，發現：建國初期，在「生產的城市」，它是工人的「學校和樂園」；文革時期，在「革命的城市」，它是宣教機構與革命場所；改革開放初期，在「開放的城市」，它是文化政治與文化市場相遇、碰撞的地方；改革開放深化期，在「消費的城市」，它被收編至「公共文化服務」話語之中。從工人文化到公共文化，從階級政治話語到市民文化權利話語，國家對文化宮記憶的整合、挪用與重構呈現出去階級化、去政治化的趨勢；此種話語策略是國家為應對社會斷裂與矛盾的特定歷史產物，也為理解中國工人階級的轉型與重構提供了國家記憶的視角。

關鍵詞：工人文化宮、工人階級、國家、記憶、文化

路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後。研究興趣：文化研究、全球傳播、中國在非洲。電郵：miaolu@cuhk.edu.hk

論文投稿日期：2019年8月19日。論文接受日期：2020年5月5日。

Research Article

From Working-Class Culture to Public Culture: Changing National Memories of the Workers’ Cultural Palace (1949–2015)

Miao LU

Abstract

For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the Workers’ Cultural Palace (WCP) is an important “site of memory.” Through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People’s Daily* and related policy document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changing national memories of WCP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new state, the WCP was the “workers’ school and paradise.” It functioned as a venue for propaganda and revolutio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 was where “cultural politics” and “cultural markets” collided in the 1980s and early 1990s, and it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discourse of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as China deepened its reform and opening-up.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appropri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WCP memories, the Chinese state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the “working-class culture” to the “public culture” and from the class discourse to the citizen discourse. The discursive dyslexia of class and politics provides a unique vantage point to understand the transformations of both the Chinese society and its working class in the past years.

Miao LU (Postdoctoral Fellow).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search interests: cultural studies, global communication, China in Africa.

From Working-Class Culture to Public Culture

Keywords: Workers' Cultural Palace, working class, state, memory, culture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Lu, M. (2022). From working-class culture to public culture: Changing national memories of the Workers' Cultural Palace (1949–2015).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60, 157–183.

致謝

作者感謝文章寫作初期王洪喆老師的建設性意見，感謝匿名評審及編委會成員提出的寶貴修改意見。

研究動機

新中國成立初期，為體現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國家為其建造了工人文化宮、療養院以及工人新村等一系列福利設施。在國家的主導下，文化宮為工人們提供了豐富多彩的學習、娛樂活動，被譽為「工人的學校和樂園」，一度成為幾代工人心中不可磨滅的集體記憶。而如今，文化宮風光不再，即使免於被拆除的命運，大多也被改造成新型消費場所，它偶爾引起人們關注，多是作為工人階級的懷舊對象以表達生存危機之感。¹當「記憶的場所」(site of memory)發生改變，人們關於場所的記憶將會如何改變？

如果說集體記憶的動員與形成關乎著階級的動員與形成 (Lee, 2000, 2007a)，那麼作為工人階級身份的象徵性場所之一，文化宮的迷失與重構不僅見證著中國工人階級的瓦解與重構，還預示著中國社會的記憶危機，其背後是當今中國應如何闡釋與記憶曾經的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的問題。如何回憶過去不僅會影響人們的行為態度和存在方式，對於一個仍在憲法層面宣稱工人階級領導地位的政黨國家，它所涉及的更是政權合法性與代表性的問題 (趙月枝、吳暢暢，2016)。

在20世紀「工人國家」的背景下，中國工人階級主體性的形成具有較強的國家導向性 (state-oriented) (Lee, 2002)。因此，中國工人階級集體記憶的建構並不是一個外在於國家話語之外的自發過程 (autonomous) 而是與其相關聯 (in relation to) (Lee, 2007a)。對於工人階級記憶、身份政治與國家記憶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本研究認為：第一，中國工人階級集體記憶的形成並非完全自主，而是會受到國家官方記憶的影響；第二，國家有形塑 (shape) 記憶霸權的能力，但並不必然掌控 (control) 或者決定 (determine) 對於複雜歷史事件的記憶，而是要運用多種策略去爭奪對記憶的主導權和闡釋權；第三，受特定社會歷史語境制約，國家記憶在不同歷史時期可能會有不連續甚至矛盾之處。因此，要理解中國工人階級記憶形成與演進的歷史動力學，我們有必要檢視國家話語如何建構、形塑記憶霸權並如何與社會歷史結構互動。

通過梳理文化宮在國家記憶文本中的關鍵詞 (keywords) 圖譜，本文試圖對國家話語中的文化宮變遷進行整體性、歷時性地勾勒，進而剖析其記憶建構的邏輯與內涵。本文不僅在現實層面為理解工人階級的轉型與重構提供了記憶的視角，在理論層面也將有助於探究政黨國家如何處理社會轉型過程中集體記憶的斷裂與分化。

文獻綜述

「工人文化宮」溯源及研究現狀

工人文化宮並不是中國獨創，而是建國後仿照蘇聯模式建造，因此帶有較深的蘇聯印記。據考證，中文裡的「文化宮」一詞即由俄語「*dvorets kulury*」直接翻譯過來 (Hung, 2013)。在蘇聯，工人文化宮的前身可追溯至19世紀末一些自由主義慈善機構及個人設立的「人民之家」(people's house, *narodnye doma*)；在這裡，工人和家屬可以進行社交、閱讀或其它一些提升自我的活動 (Siegelbauma, 1999)。二十世紀早期，隨著工人運動的興起，「人民之家」開始被用作工人階級的社區活動中心，工會和工人政黨往往在「人民之家」的基礎上設立新的文化與教育機構。20世紀20至30年代，布爾什維克黨興建了許多工人俱樂部 (workers' clubs)，其中規模較大、較豪華的通常被稱為「文化宮」 (Siegelbauma, 1999)。

在建設新政權的過程中，為使文化也服務於新的蘇聯秩序，工人文化宮、俱樂部成為了「共產主義的學校」、「無產階級社區的組織者」 (Hatch, 1994)。不過，它們並不是一個只接受國家指令而與外部世界隔絕的封閉空間。John Hatch (1994) 的研究發現，1920年代莫斯科工人俱樂部是工人、國家及不同類型的都市文化相遇的地方，或者說文化政治 (cultural politics) 與文化市場 (cultural market) 相遇的地方，包括大眾的、商業的、資產階級的以及官方的 (蘇聯式的) 文化交匯在這裡相互競爭以爭奪文化支配地位。

Lewis H. Siegelbaum (1999) 考察了蘇聯的工人文化宮、俱樂部在建造過程中所遭遇的「身份危機」，指出這不僅是一個建築美學問題，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0期(2022)

其背後是人們對其社會功能定位問題的爭論：十月革命之後，工人文化宮、俱樂部在建設新社會的過程中應該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從「人民之家」到「工人文化宮」不僅是名稱的轉變，而是涉及了對新文化生成的政治經濟學論述，即文化和教育如何作為一種公共產品 (commons) 被勞動階層自身生產出來，並被如何實踐 (王洪喆，2015)。

洪長泰在對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的研究中認為，在為首都人民提供娛樂休閒活動的名義之下，它其實是中共進行政治宣傳的場所，是一個「政治公園」(a political park) (Hung, 2013)。他認為，勞動人民文化宮反映了國家政權對於社會空間的控制，導致了市民私人生活空間的大量流失。另外，劉宇 (2013) 勾勒了勞動人民文化宮在建國後十七年間的運行狀態，指出它承載著「娛樂」與「革命」的雙重功能。

邢國欣考察了新時期鄭州工人在「五一公園」(即昔日的「河南省工人文化宮」) 內的文化休閒活動，發現這一公共空間正在被重新政治化，並視其為「無產階級公共領域」(proletariat public sphere) 的形成 (Xing, 2010)。根據邢的觀察，五一公園裡的鄭州工人由於對毛澤東的不同態度而分裂為三個陣營，他們的分歧反映了在市場經濟改革中被摧毀的工人階級對於毛時代的複雜情感與記憶。邢認為，正是在文化宮這一政治性空間中，正是在對社會主義遺產及工人階級身份地位的辯論中，鄭州工人的階級意識才得以在改革時期重新形成，明顯將自身與城市中產階級區別開來，從而預示著階級政治在當代中國社會的回歸。

王洪喆與邱林川 (2015) 在對新老工人階級文化空間與聲音的研究中比較了遼寧鞍山和北京皮村兩個個案。他們發現，鞍鋼工人文化宮的空間在過去幾十年經歷了再封建化，變得越來越封閉，使得普通工人失去了進入文化宮的可能性。雖然鞍山工人找到了新的方式開展文化生活，但不同於皮村工人自覺勾連自己的工人階級身份以召喚「新工人」階級的出現，鞍山工人的文化空間是一個更接近「市民」(civic) 的公共城市空間，而不是工人階級的空間。不過他們提醒道，鞍山工人的文化活動延續了社會主義城市生活的集體意識和共同情感，這也可能成為未來階級意識回歸的基礎。

從時間段來看，學界對文化宮的研究呈斷裂狀態，主要集中在建國初期和過去二十年，中間階段幾乎是空白。從研究視角來看，上述研究涉及「空間政治」、「公共領域」以及「聲音」等視角，但尚未有「記憶」的視角。從國家記憶的視角出發，本文試圖勾勒一個歷時性的文化宮變遷圖景，並將其置於中國社會轉型的背景下剖析其深層邏輯與內涵。

記憶、身份與政治

在Halbwachs (1980) 看來，記憶是立足於現在對過去的重構，並且記憶的建構與身份的建構密不可分。不過，不同研究路徑對記憶主體及其機制的理解不盡相同。以Pierre Nora為代表的「記憶—國家」路徑 (memory-nation nexus) 視民族國家為重要的記憶主體，強調其形塑國族身份認同的作用 (Nora, 1989; Olick, 2008)。與此相反，大眾記憶研究認為記憶的主體在民眾，強調民眾尤其是邊緣群體如何發展出與主流記憶相對立的「反記憶」 (counter-memory) (Foucault, 1977)。近年來記憶研究的傳播學取向強調將新聞生產視為一種記憶實踐 (mnemonic practice)，關注新聞媒體如何參與記憶生產，形塑集體記憶 (李紅濤、黃順銘，2017；周海燕，2013；陳振華，2016；陳韜文、李立峯，2010)。例如，陳韜文與李立峯 (2010) 的研究發現香港的六四記憶是傳媒、社會組織和民族國家三個主要行動者在特定社會政治環境下相互角力的結果。周海燕 (2013) 考察了國家媒體話語如何塑造出以「南泥灣精神」為核心的大生產記憶，使其成為重要的政治合法性資源。

對於中國工人階級而言，國家官方記憶與民間記憶之間的差異固然存在，但並不是簡單的二元對立關係，而是一個複雜的相互形塑的過程。由於毛澤東時期社會主義工業化是由國家力量而非市場力量所主導，中國工人階級主體性的形成顯示出獨特的國家中心主義 (Lee, 2002)。從早期的「翻身」、「訴苦」實踐，到「勞動模範」的塑造，再到現在的「紅色教育」，對記憶的動員與整合歷來是共產黨用來鍛造政權合法性與政治主體性的重要手段之一 (周海燕，2013)。由於共產黨向來以闡述底層民眾利益為己任，1949年以後當工農群體言說之時，他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0期(2022)

們通常也會使用國家所提供的詞彙來言說(Lee & Yang, 2007)。以改革開放為界，中國工人階級可簡單劃分為新老兩個工人群體——前者為改革開放時期的流動農民工，後者為計劃經濟時期的老工人。成長於不同歷史時期，新老工人在工作經驗、文化實踐以及身份認同等方面都有顯著不同(王洪喆、邱林川，2015；Lee, 2007a, 2007b; Ngai, 2005)。但不管是東北工人遊行時高舉毛澤東像還是南海本田工人罷工時高唱國歌，新老工人都曾在集體行動中策略性地挪用社會主義的革命記憶(馮象，2014；Lee, 2007b)。

概括而言，記憶作為一股政治力量，不僅是政黨用作國家建設的微觀基石，也是邊緣群體用以批評社會不公的策略與武器，還為特定社會群體建構自身身份以及想像替代性未來提供了情感與理論基礎。因此，要理解國家與工人階級之間以及工人階級內部之間記憶的互動、分裂和分化，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包括文化宮在內的社會主義歷史與記憶。

基於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兩個主要研究問題：(1) 中國國家話語在不同歷史時期內建構了怎樣的文化宮記憶？有著怎樣的主題與情節？(2) 國家運用了怎樣的話語策略去挑選、整合與重構有關文化宮的記憶？有著怎樣的邏輯與內涵？

研究方法

本文運用歷時性的批判話語分析來考察國家記憶中的文化宮流變。批判話語分析認為話語變遷與社會變遷是緊密相連的：話語作為一種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既為社會所形塑又形構社會(socially shaped and socially constitutive)，二者之間是辯證(dialectical)關係(Fairclough, 1992; Wodak, 2001)。整合微觀的語言學分析與宏觀的社會理論分析，Norman Fairclough的分析模型從文本(text)、話語實踐(discursive practice)、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三個向度來進行話語分析，後期他又將其修正為從具體到抽象的社會事件、社會實踐和社會結構三個層次；前者多處理單一文本，而後者多處理以「議題」為中心的一組文本(Fairclough, 1992, 1995, 2010)。

本文以「國家記憶中的工人文化宮」為研究議題，通過歷時性的批判話語分析來探究文化宮話語變遷與中國社會變遷之間的互動與張力。本文有三個研究目標：

(a) 話語層面，識別出國家話語在建構文化宮記憶時所使用的主要「故事情節」(storyline)；

(b) 文本層面，辨析出國家話語用以建構主要故事情節所運用的話語策略，以對關鍵詞的分析為主，以對特定口號與流行語的分析為輔；

(c) 將(a)與(b)放置在相應的社會歷史語境下，考察國家話語有關文化宮記憶的生產與建構如何與社會、文化及政治經濟結構互動、勾連。

本文的研究文本主要有三個來源——中國國家機關報《人民日報》、文化宮相關的檔案及政策文件。《人民日報》相關文本通過在其圖文數據庫(data.people.com.cn/rmrb)以「文化宮」為搜索關鍵詞而獲得。² 篩選標準設定為「報道以工人文化宮為報道主體或涉及在工人文化宮裡舉辦的活動」；研究時段始於新中國成立，止於第十二個五年規劃時期，具體搜索日期為1949年10月1日至2015年10月1日；經過篩選最終獲得1,097篇符合要求的報道。對檔案、政策文件的分析是為了探究文化宮所受到的政策制約並監測歷史語境的變化，主要通過訪問中國政府網站以及在北京市檔案館查閱資料而獲得。

由於批判話語分析所涉及的理論譜系與語言分析工具複雜多元，在具體研究中如何選擇與操作應該以「問題」為導向(problem-oriented) (Wodak, 2001)。本文借鑒但並不完全照搬Fairclough的三向度分析模型，而是同時結合文化研究中對關鍵詞的歷史社會分析來展開。本文選擇關鍵詞作為主要的語言分析工具有兩個原因。第一，對特定詞彙的統計和分析是常用來考察話語策略的方法之一，已有研究也表明語言的變遷是中國社會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周海燕, 2013; Liu & Ouyang, 2016)。第二，在預讀文本的過程中，筆者發現《人民日報》在不同歷史時期報道文化宮時使用了較為不同的關鍵詞及一些策略性的口號與流行語，其背後預示著不同的故事情節與意涵。借鑒Raymond Williams的經典著作*Keywords* (2015)，本文將「關鍵詞」定義為「對講述文化宮故事重要且相互關聯、對詮釋文化宮意涵重要且具有指示性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0期(2022)

(indicative)的詞語」。作為一個啟發式(heuristic)的研究，本文試圖歸納與梳理文化宮在官方記憶文本中的關鍵詞變遷圖譜。

具體操作步驟如下：(1)通讀文本，歸納、挑選出符合本文定義並頻繁出現(10次以上)的關鍵詞，不限數量，得到一個包含186個關鍵詞的詞庫；(2)結合報道文本分佈規律、關鍵詞的意義指向以及中國當代歷史進程，將《人民日報》文本劃分為四個階段；(3)統計186個關鍵詞在四個階段的出現頻數，挑選出20個在整體階段都頻繁出現的作為共有關鍵詞(在三個及以上階段出現頻數超過10次，總體超過150次)，針對每個階段再各選出20個特有高頻關鍵詞(在特定階段出現頻數超過30次)，共得到100個關鍵詞作為分析對象；(4)統計關鍵詞頻數，分析其深層意涵，考察話語策略，識別故事情節。概括來講，本文主要運用歸納法(induction)通過兩輪篩選而獲得關鍵詞，不僅考慮其定義接近性也參考頻率這一量化指標，是圍繞研究問題反覆研讀與修正而實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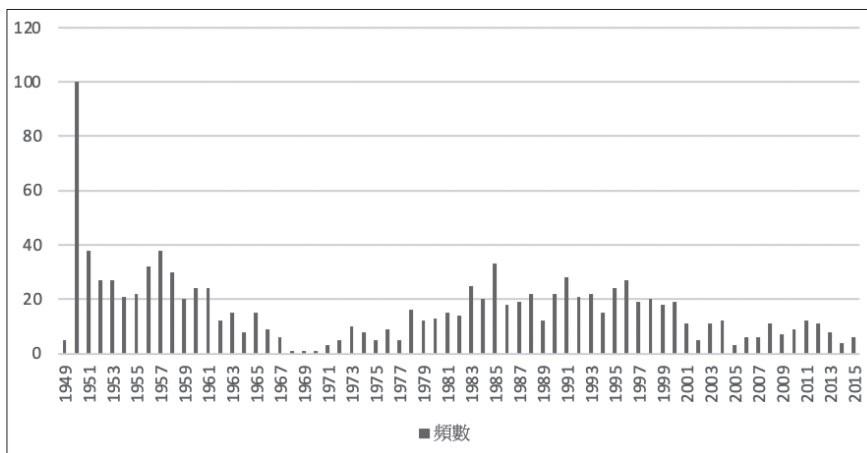
研究發現

樣本描述

圖一顯示了《人民日報》的文化宮報道在六十多年間的數量分佈。如前所述，本文將其劃分為四個階段：(1)建國初期(1949–1965)，報道呈井噴態勢，共458篇，佔41.8%，僅1950年就有100篇(9.1%)；(2)文革時期(1966–1977)，³報道進入低谷期，共63篇，佔比僅為5.7%；(3)改革開放初期(1978–1991)，數量分佈較為均衡，共269篇，佔比約24.5%；(4)改革開放深化期(1992–2015)，⁴共307篇，佔比28.0%。可以看出，建國初期是文化宮報道的高潮期，經歷了文革的低谷期之後開始回升，但改革開放之後《人民日報》對文化宮的關注度已遠遠不及建國初期。

從「工人文化」到「公共文化」

圖一 《人民日報》文化宮報道數量分佈



表一 共有關鍵詞頻數分佈

| 關鍵詞 | 建國初期 | 文革時期 | 改革開放初期 | 改革開放深化期 | 總計 |
|------|-------|------|--------|---------|-------|
| 文化 | 1,272 | 145 | 833 | 1,875 | 4,125 |
| 人民 | 2,346 | 654 | 470 | 342 | 3,812 |
| 工人 | 1,382 | 291 | 359 | 474 | 2,506 |
| 職工 | 347 | 69 | 239 | 551 | 1,206 |
| 勞動 | 909 | 153 | 351 | 359 | 1,772 |
| 展覽 | 982 | 31 | 251 | 121 | 1,385 |
| 革命 | 336 | 812 | 50 | 14 | 1,212 |
| 群眾 | 342 | 274 | 197 | 320 | 1,133 |
| 生產 | 529 | 109 | 48 | 51 | 737 |
| 技術 | 486 | 34 | 67 | 48 | 635 |
| 階級 | 138 | 422 | 17 | 20 | 597 |
| 學習 | 312 | 156 | 51 | 66 | 585 |
| 工業 | 301 | 51 | 69 | 40 | 461 |
| 鬥爭 | 219 | 198 | 35 | 6 | 458 |
| 社會主義 | 227 | 129 | 55 | 44 | 455 |
| 服務 | 80 | 26 | 76 | 223 | 405 |
| 政治 | 141 | 67 | 34 | 25 | 267 |
| 經濟 | 94 | 20 | 55 | 104 | 273 |
| 娛樂 | 30 | 1 | 50 | 83 | 164 |
| 交流 | 42 | 13 | 62 | 39 | 156 |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0期(2022)

表一顯示了20個共有關鍵詞的頻數分佈，其中有八個關鍵詞總計頻數超過1,000次：除「文化」外，有四個人稱指示代詞——「人民」、「工人」、「職工」、「群眾」指向著文化宮主體身份的多樣性與複雜性，有三個描述活動的關鍵詞——「勞動」、「展覽」、「革命」指向著文化宮所承載的活動與功能的多樣性與複雜性。圖二分別顯示了四個歷史時期的高頻關鍵詞分佈，對其的分析將在下個部分逐一展開。

圖二 不同歷史時期高頻關鍵詞分佈



文化宮記憶的四種「故事情節」

I. 「生產的城市」：「翻身」——工人的「學校和樂園」

根據圖二 (a)，建國初期最高頻的關鍵詞是「人民」，出現了2,346次；其次是「工人」，出現了1,382次。無論是「人民革命」、「勞動人民」還是「工人」、「工人階級」，其背後指向的都是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而誕生的新的政治主體。圍繞文化宮，《人民日報》通過「人民」、「工人」、「文化」、「解放」、「革命」、「階級」等一組關鍵詞講述了一個「翻身」故事。例如，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是新中國建造的第一個工人文化宮，坐落在天安門東側，於1950年在太廟舊址興建。太廟在明清兩代是皇家祭祀祖先之地，尋常百姓無法入內；從太廟到勞動人民文化宮，有著極強的政治象徵意義。李立三在開幕演講時說：

這說明我們工人階級是真正的翻身了，過去勞動是被輕視的，勞動人民是被剝削被壓迫的……正如太廟原為勞動人民修建起來的，一修好後勞動人民根本就不能進來了。今天人民革命勝利了，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勞動人民就將幾千年的歷史扭轉了過來。（《人民日報》，1950年5月1日：3）

在這一案例中，文化宮對封建統治空間的置換以及勞動人民命運的今昔對比論證了新政權的合法性，而建造在城市中心的文化宮則隱喻了工人階級在新政權中的主體地位。不過，在其他一些案例中，《人民日報》講述「翻身」故事時往往不直接使用「翻身」⁵一詞，而是運用平民化的語言來敘述勞動人民解放前後巨大的生活轉變；也就是說，「翻身」作為一種話語實踐有時是隱蔽 (latent) 在《人民日報》的文本結構中。

剩下的高頻關鍵詞可大致分為兩組，「勞動」、「技術」、「蘇聯」、「建設」、「工業」、「社會主義」描述的是「生產」，而「文化」、「展覽」、「慶祝」、「聯歡」描述的是「生活」。這說明，建國初期的文化宮是一種試圖協調生產與生活的城市空間實踐，這與當時社會主義工業化與城市化的背景密不可分。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上宣佈「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並指出，「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0期(2022)

展」(毛澤東，1969：1317-1318)。《人民日報》隨即發表評論文章稱要「把消費的城市變為生產的城市」(1949年3月17日：1)。不過，以農民運動起家的中共並無管理城市的經驗，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以蘇聯模式為參照在全國各大城市改建或修建了工人文化宮。1960年代初期，光首都北京就建成了1,300多個工人文化宮、俱樂部(Hung, 2013)。

儘管各地的文化宮空間形態不盡相同，但就其發揮的功能來說，則大同小異。1950年8月，中華全國總工會(後稱「全總」)召開第一次工會俱樂部會議，明確規定工人文化宮、俱樂部的任務是，「通過各種文化、藝術、體育活動，提高工人、職員群眾及其家屬的政治、文化、科學、技術水平，樹立新的勞動態度，增進工人、職員群眾的身心健康，以保證生產計劃的完成」(梁澤楚，1989：41)。1950年上海市工人文化宮成立時，陳毅市長專門贈送了題有「工人的學校和樂園」的匾額，並題詞「面向生產，學習文化」。

「工人的學校和樂園」——這一官方創造的「流行語」在日後工人們回憶文化宮時也經常被提及，這不僅是因為新聞文本的反覆使用所產生的社會烙印作用，對工人們來說，文化宮作為「學校和樂園」並不是一個空洞的政治口號，而是曾經鮮活的生命記憶與體驗。建國初期文化宮舉辦的活動不僅包括圖片展、漫畫展、勞模報告會、生產展覽會，還包含音樂會、籃球賽以及各種遊園與聯歡活動等。1950年至1958年，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了104次遊園會，吸引群眾人數總計達4,881,515人次；聯歡活動76次，吸引群眾人數總計達271,007人次」(北京市檔案館，1961)。

從政策安排來看，建國初期，國家投入了大量經費來保障工人業餘文化的培育。由於文化宮的建設經費主要來自工會文教經費以及政府補貼(梁澤楚，1989：41)，工人們每年只需繳納幾塊錢的象徵性會費，便可成為文化宮的會員。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開幕初期，白天一般市民佔70%，只有晚間工人才佔半數以上；1950年，該宮就是否發售門票問題向市委、全總請示，其列舉的首要原因不是經費不足，而是「我們認為若再不售票，則文化宮大部時間是為小市民服務」(北京市檔案館，1950)。建國初期國家話語對文化宮階級屬性的強調是顯而易見的，這一時期，《人民日報》提及文化的次數(1,272次)與提及工人的

次數(1,382次)幾乎持平,也就是說,對於這一時期的文化宮,講文化就是講工人文化;本質上,文化宮是一個「工人文化空間」,有著特定的階級屬性與政治屬性,這是文化宮記憶在建國初期國家話語中的獨特之處。

II. 「革命的城市」:「鬥爭」——宣教機構與革命場所

文革期間,《人民日報》報道文化宮的頻率大大降低,這與文化宮遭到嚴重破壞不無關係。由於與蘇聯交惡,解放後照搬蘇聯的城市規劃模式被批判為修正主義。文革期間,多數文化宮或被停用或被佔用,無法正常開展活動,例如:

原蘭州市工人文化宮佔地近百畝,有劇場、展覽室、文藝廳、健身房、燈光球場、滑冰場、旱地溜冰場、「兒童樂園」和一百多間活動室;文革開始之後雜草叢生,殘牆破壁,活動室多處被佔用,「兒童樂園」變成積肥隊的糞便存積處。(《人民日報》,1979年9月22日:3)

根據這一時期的報道文本,未被停用的文化宮大多已淪為意識形態濃重的「宣教機構」與「革命場所」。文革期間城市空間的建設與管理主要服從政治運動的需要,分別位於天安門東西兩側的勞動人民文化宮和中山公園作為兩個極具象徵意義的革命場所,經常出現在報道文本中。

如圖二(b)所示,《人民日報》在文革期間使用最多的關鍵詞是「革命」(812次),它是這一時期的主要「故事情節」。不過,與建國初期常用的「社會主義革命」不同,這裡的革命指的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通常與「鬥爭」、「批判」、「工農兵」等一些文革特有的關鍵詞一同出現。例如,1968年,《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文章稱:

一走進那些文化宮、電影院,看到舞台上、銀幕上,盡是洋人、死人、古人佔統治地位,看不到我們工農兵的高大形象,心裡憋得透不過氣來……解放都十幾年了,我們工農兵早就翻身當了國家的主人,為什麼在文藝舞台上翻不了身?……原來,文藝舞台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0期(2022)

上也存在著誰專誰的政的問題……我們深深體會到，我國億萬工農兵革命群眾同文藝黑線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人民日報》，1968年5月24日：4)

在對「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批判之下，很多解放初期文化宮舉辦過的文娛活動遭到批判和抵制。文革期間，雖然「文化」、「文藝」、「慶祝」、「聯歡」等仍然是高頻關鍵詞，但文化宮的舞台上很少能再見到建國初期的那種豐富多彩，取而代之的是各種革命歌曲、革命舞蹈、革命影視劇，「工人文化」為「革命文化」所主導，並且多數都圍繞著對毛澤東的歌頌而展開。文革期間的63篇新聞文本中，「毛澤東/毛主席」出現了709次(平均每篇11次)，超過了「人民」(654次)和「工人」(291次)。

概括來說，文革期間的文化宮是一個「革命文化空間」，文化娛樂功能大大減弱，宣教功能被放大，政治指向性非常之強。從情感的角度看，《人民日報》所建構的文化宮記憶在這一時期是感情色彩最為強烈的，高頻關鍵詞中「偉大」(290次)、「勝利」(190次)和「萬歲」(96次)描述的都是一種異常激情、亢奮的革命狀態。事實上，文化大革命不僅有其激情、亢奮的一面，更有其創傷、暴力的一面。例如，東北工人對於文革的記憶敘述就提到了暴力、恐嚇、背叛、自殺以及來自上級官僚的性騷擾(Lee, 2007a)。與此不同，《人民日報》的文本突出呈現的是革命記憶激情亢奮的一面，此處也可看出權力是如何介入記憶的生產，通過挑選與遮蔽從而塑造出一個符合官方話語的記憶故事。

III. 「開放的城市」：「交流」——文化政治遇到文化市場

1978年，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並且實行改革開放。從圖二(c)可以看出，改革初期文本的人稱代詞中，「人民」(470次)和「工人」(359次)的出現頻率較之前大幅減少，而「職工」(239次)、「群眾」(197次)和「青年」(166次)的出現頻率大幅增加，呈現出一種去政治化、去階級化的趨勢。

1979年，不少讀者來信抱怨業餘文化生活的缺乏讓人萎靡不振，《人民日報》(1979年9月22日：3)於是發文呼籲有關方面「要關心職工

從「工人文化」到「公共文化」

的業餘文化生活」。隨後的1981年，中央又下發《關於關心人民群眾文化生活的指示》。在此背景下，政府收回、重建或者新建了許多文化活動場所，不僅包括工人文化宮，也有文化館、農村文化站等，初步建立了從市到區（縣）再到基層的三級文化網絡。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文化政策不僅針對工人群體，而是更加廣泛化的。

改革開放初期，「文化」一詞共出現了833次，但它所指代的不僅限於「工人文化」，還可能是「群眾文化」、「青年文化」，甚至是「法國文化」或「德國文化」。此時的文化宮充當了一個改革開放的窗口、文化交流的平台，這是改革初期文化宮記憶的主要「故事情節」。根據報道文本，文化宮經常舉辦各種展覽會與交流會，不僅向國人介紹外國文化、科技與產品，也向參訪的外國友人展示中國文化與民俗民情（人民日報，1980年11月3日：4，1990年8月26日：4）。因此，「展覽」、「開幕」與「交流」都是這一時期的高頻關鍵詞。

對於另一個高頻關鍵詞——「建設」，它在建國初期主要指「工業化建設」，而在改革開放之後則多指「經濟建設」。在《人民日報》的文本中，國家對文化宮經濟效益的強調是改革開放之後伴隨著文化宮的市場化改革才出現的。1987年，全總召開第四次全國工人文化宮、俱樂部工作會議，對文化宮的改革作出全面部署，確定了「簡政放權」、「以文為主，多業助文」的改革方案，允許文化宮進行商業性經營活動，自此拉開文化宮改革的序幕（王嬌萍，2011）。1989年，《人民日報》曾刊發兩篇報道介紹貴陽市文化宮與長沙市文化宮的改革事蹟：前者將單一的文藝服務擴展到了經濟服務領域，成為了「企業家的新知己」（1989年1月12日：3）；後者成功變身為集豪華舞廳、影劇院、棋室、露天茶廳等設施為一體的「豪化宮」（1989年9月2日：5）。從經營的角度來看，由於各地文化宮多處城市中心繁華地帶，稍加經營便業績不凡，因而在改革初期所受到的衝擊還不甚明顯。也正是基於此，很多城市將文化宮定性為自收自支事業單位，實行完全的企業化管理。

概括來講，《人民日報》在改革初期所建構的文化宮記憶是關於舊文化與新文化、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交流和碰撞。借鑒John Hatch (1994) 的說法，這是「文化政治」與「文化市場」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0期(2022)

的相遇和對抗。改革初期，「文化市場」還未佔主導，文化宮仍被看作是進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陣地。不過隨著市場競爭的進一步加劇，文化宮很快敗下陣來，開始了其在市場經濟大潮中的浮沉。

IV.「消費的城市」：「變身」——轉向公共文化服務話語

90年代以後，隨著文化宮市場化改革的深入，一組新的具有時代烙印的詞彙開始出現在《人民日報》文本中，包括「市場」、「經營」、「副業」、「公司」、「資金」、「出租」等。如圖二(d)所示，在改革開放深化期，「市場」一詞出現的次數最多(113次)。根據全國地方工人文化宮、俱樂部情況調查組(2011)的報告，2011年，全國共有工人文化宮、俱樂部1,302個，其中約760個為自收自支，「以文為主，多業助文」很快變為「以商養文」。各地文化宮在改革初期的紅利很快消耗殆盡，生存艱難。不同於之前對市場化改革的正面報道，《人民日報》在改革深化期提出了不少質疑與反思之聲。

例如，2012年，《人民日報》發表題為〈讓工人文化宮名至實歸〉的讀者來信，作者稱：

想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遍佈各地的工人文化宮，曾經有過的熱鬧景象，那時的活動不僅豐富，而且培養了大批業餘文藝骨幹……現在，面對工人文化生活貧乏的困境，能否找到合適的途徑將工人文化宮「變身」回來呢？一是歸還給「工人」，二是歸還給「文化」……(《人民日報》，2012年3月27日：24)

可以看出，作者對於建國初期文化宮記憶的策略性使用不僅是希望文化宮可以退商還文，而且是退還給工人，只有這樣工人文化宮才「名至實歸」。

2011年，《人民日報》發表「尋找工人文化宮」系列報道(2011年4月28日：12，2011年4月29日：12)，也曾追憶文化宮所承載的「幾代人的青春記憶」，不過，對於文化宮該如何「變身」，國家話語給出了不同答案。在改革深化期，「公共」、「服務」與「公益」是幾個經常一起出現的高頻關鍵詞。這是因為，在此時的國家政策文件中，文化宮被定

從「工人文化」到「公共文化」

義為公共文化事業單位。1997年，全總發佈《關於進一步加強縣以上工人文化宮、俱樂部建設的若干意見》，指出工人文化宮的性質是「工會所屬的社團所有制並實行定額補貼的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2006年，中央印發《「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首次在國家文件中使用「公共文化服務」的概念，並提出「公共服務普遍均等」的原則；2012年，國家發佈《「十二五」時期文化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將工人文化宮納入到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設之中（中國政府網，2006年9月13日，2012年2月15日）。

政策與新聞語詞的改變反映的是國家話語對於文化宮社會功能定位的調整。與全總在1950年的定義相比，文化宮的屬性已從「工人」的「工」悄然轉變為「公共」或者「公益」的「公」了。不同於毛時代建基於階級政治的「文化福利」，「十一五」之後的「公共文化服務」政策強調的是市民（citizen）話語框架下的「文化權利」（吳理財、謝勝利，2019）。改革深化期，《人民日報》較多使用「職工」一詞（551次），它所指向的更多是公民權語境下的「市民」主體，而不是階級政治意義上的「工人階級」主體。

在新的話語框架下，文化宮服務主體似乎是擴大了——由服務工人階級擴大至整個城市居民；但事實上，受限於身份以及價格門檻，很多中下階層的市民都被擋在了文化宮大門之外。2000年以後，為突出文化宮的「公共」屬性，《人民日報》不時報道在文化宮裡舉辦的公益活動，如慰問演出、免費電影專場等，而被關愛的對象常常是兩類特殊的工人群體——「下崗職工」與「農民工」（2000年1月12日：3，2014年5月2日：4）。前者雖為市民，但其生活境遇已經淪為城市底層，後者因戶籍制度的阻礙尚未獲得完整的城市工人身份。

概括而言，國家話語在改革深化期建構了一個作為「公共文化空間」的文化宮記憶。從「工人」到「公共」，在概念的模糊與置換之下是服務主體的模糊和置換，而這不僅意味著文化宮主體性的消解與重構，也標誌著工人階級的轉型與重構。

結論與建議

談論記憶而不提及空間是不可能的。在中國的城市空間中，文化宮是工人階級用來定位記憶、維護認同的重要「記憶場所」。將新聞生產看作是一種記憶實踐，本文分析了中國國家媒體書寫文化宮記憶所使用的主要「故事情節」，並結合檔案與政策文件剖析了其在不同歷史語境下的邏輯與內涵，發現：建國初期，在「生產的城市」，文化宮是工人的「學校和樂園」；文革時期，在「革命的城市」，它是宣教機構與革命場所；改革開放初期，在「開放的城市」，它是文化政治與文化市場相遇、碰撞的地方；改革開放深化期，在「消費的城市」，它被收編至公共文化服務話語之中。

基於對關鍵詞、口號與流行語的分析，本文揭示了國家記憶中的文化宮如何從建國初期的「工人文化」、文革時期的「革命文化」轉向改革初期的「商業文化」以及改革深化期的「公共文化」。通過運用去政治化、去階級化的話語策略，國家完成了從政治、革命話語向經濟、市場話語的轉變。如果說在計劃經濟時期，得益於政府撥款，文化宮可以只考慮社會效益，不考慮經濟效益；在改革初期，文化宮勉強能夠實現社會、經濟效益並重；那麼到了改革深化期，迫於生存壓力，文化宮便主要轉向經濟效益了。

本文發現，在文化宮的案例中，國家話語對文化空間「公共性」的闡釋包含著兩種系譜學——毛時期的階級政治話語與改革時期的市民權利話語。「十一五」以來，在有關「公共文化服務」的官方表述中，市民文化權利話語取代階級政治話語成為主導話語。隨著中國變身為「世界工廠」，當一個新的工人階級正在中國大地呼之欲出之時卻遭遇了階級話語的消逝，這是中國階級政治的悖論（潘毅、陳靜慈，2008）。儘管新工人的規模比老工人龐大得多，儘管他們有著巨大的文化需求，但在城市中卻很難找到屬於自己的「學校和樂園」。正如Lefebvre (1979)所言：如果未曾生產一個合適的空間，那麼「改變生活方式」、「改變社會」等都是空話。如果沒有場所，沒有陣地，新工人的文化娛樂活動將如何展開？集體記憶將如何承載？

面對中國日益加深的社會分化與不平等，如何重構及闡釋社會結構與階級關係仍然是一個重要工程。不可否認，20世紀的階級政治與集體記憶仍然為中國工人階級未來的集體行動及主體性的重建提供著歷史資源與可能性。對社會主義時代的重訪與追憶並不是想退回到過去的簡單懷舊，而是對平等、有機的社會關係的渴求，是對一個為工人提供了有尊嚴的主體位置的社會的嚮往，也是對反抗西方資本主義霸權的主體意識的呼喚（王洪喆，2015；呂新雨，2004）。

以文化宮為切入點，本文重訪了社會主義時期的工人文化空間實踐，展現了國家力量如何書寫與建構工人階級身份與集體記憶。本文發現文化宮的官方記憶並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呈斷裂、不連續狀態。面對改革開放過程中急遽的社會轉型，國家試圖通過去政治化、去階級化的話語策略來應對集體記憶的分裂與分化，以爭奪對記憶的主導權和闡釋權。這並非沒有矛盾之處。正如潘毅和陳靜慈（2008）所言，階級話語缺失症（discursive dyslexia）不僅在勞工政策方面阻礙和限制了新工人階級的形成，而且在理論層面給強調個人主義、開放市場的新自由主義掃清了道路，消解了對中國向全球資本主義轉型的可能的批評。在實踐層面上，文化宮在新時期為哪些人群提供了何種公共性，並在多大程度上不同於其它文化消費場所仍有待觀察。例如，山西省貧困縣蒲縣曾計劃投資1.18億元建造文化宮，引發人們普遍質疑這樣的改革究竟是「民生工程」還是「形象工程」（人民日報，2010年7月16日：12）。由於本文主要依靠官方媒介文本來探究文化宮記憶的國家視角，因此不能細緻呈現國家力量如何在不同地方案例中鋪展開來，也就不能有效呈現官方記憶與地方記憶的互動與張力，這是本文的局限性所在。未來研究可重點探究文化宮的民間與地方記憶，不僅要在話語層面關注不同系譜學對文化公共性的闡釋與爭奪，而且要在實踐層面關注各方力量（如：各級政府、資本、工人）如何介入文化宮的具體改革過程，如何爭奪、形塑新的身份認同、制度安排與集體記憶。除文本分析外，未來研究還可使用民族誌、深度訪談或口述歷史等多種研究方法。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0期(2022)

註釋

- 1 具體可參考中工網對工人文化宮所作的系列報道：<http://acftu.worker.cn/45/111018/16/111018160420820576253.shtml>。
- 2 鑒於工人文化宮有時會被簡稱為「文化宮」或「某某文化宮」，本研究以「文化宮」為關鍵詞進行搜索，但會排除掉關於民族文化宮、科學文化宮等一些不相關的報道。
- 3 學界一般將1976年10月作為文革結束的日期，但由於《人民日報》的文化宮文本從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才開始與文革期間有大的不同，故本研究將1977年也歸入第二階段。
- 4 本文將改革開放細分為兩個階段是因為詞庫中有關文化宮市場化改革的關鍵詞自90年代才開始大量出現，這說明文化宮的沒落與變身並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一個緩衝期。學界一般也將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的提出作為中國深化市場改革的標誌。因此，本文以1992年為界將改革開放劃分為初期與深化期兩個階段。
- 5 「翻身」是詞庫中186個關鍵詞之一，但統計頻數後發現它的出現頻率並不高，故第二輪篩選未收錄。考慮到它在話語層面的重要性，本文用它來概括建國初期文本的「故事情節」。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人民日報》(1949年3月17日)。〈把消費城市變成生產城市〉，第1版。
Renmin ribao (1949, March 17). *Ba xiaofei chengshi biancheng shengchan chengshi*, p. 1.
- 《人民日報》(1950年5月1日)。〈勞動人民文化宮揭幕，李立三及捷大使等均往致賀〉，第3版。
Renmin ribao (1950, May 1). *Laodongrenmin Wenhua Gong jiemu, Li Lisan ji Jie dashi deng junwang zhihe*, p. 3.
- 《人民日報》(1968年5月24日)。〈開展革命大批判，勇敢捍衛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第4版。
Renmin ribao (1968, May 24). *Kaizhan geming da pipan, yonggan hanwei Mao zhuxi geming wenyi luxian*, p. 4.

從「工人文化」到「公共文化」

- 《人民日報》(1979年9月22日)。**〈要關心職工的業餘文化生活〉**，第3版。
Renmin ribao (1979, September 22). Yao guanxin zhigong de yeyu wenhua shenghuo, p. 3.
- 《人民日報》(1980年11月3日)。**〈北京國外新產品樣品陳列會開幕〉**，第4版。
Renmin ribao (1980, November 3). Beijing guowai xin chanpin yangpin chenliehui kaimu, p. 4.
- 《人民日報》(1989年1月12日)。**〈企業家的新知己——貴陽市工人文化宮為經濟服務紀實〉**，第3版。
Renmin ribao (1989, January 12). Qiye jia de xin zhiji—Guiyangshi Gongren wenhuagong wei jingji fuwu jishi, p. 3.
- 《人民日報》(1989年9月2日)。**〈豪華宮裡的「老樞」——長沙市工人文化宮籌建處艱苦創業的事跡〉**，第5版。
Renmin ribao (1989, September 2). Haohuagong li de “laokou”—Changshashi Gongren wenhuagong choujian chu jianku chuangye de shiji, p. 5.
- 《人民日報》(1990年8月26日)。**〈亞運會藝術節開幕式準備就緒〉**，第4版。
Renmin ribao (1990, August 26). Yayunhui yishujie kaimushi zhunbei jixu, p. 4.
- 《人民日報》(2011年4月28日)。**〈尋找工人文化宮(上)〉**，第12版。
Renmin ribao (2011, April 28). Xunzhao gongren wenhuagong (shang), p. 12.
- 《人民日報》(2011年4月29日)。**〈尋找工人文化宮(下)〉**，第12版。
Renmin ribao (2011, April 29). Xunzhao gongren wenhuagong (xia), p. 12.
- 《人民日報》(2012年3月27日)。**〈讓工人文化宮名至實歸〉**，第24版。
Renmin ribao (2012, March 27). Rang gongren wenhuagong mingzhi shigui, p. 24.
- 毛澤東(1969)。**〈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頁1314–1329)。北京：人民出版社。
Mao Zedong (1969). Zai Zhongguo Gongchandang di qi jie zhongyang weiyuanhui di er ci quanti huiyi shang de baogao. In Mao Zedong, *Mao Zedong xuanji (di si juan)* (pp. 1314–1329).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 中國政府網(2006年9月13日)。**〈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取自 http://www.gov.cn/jrzg/2006-09/13/content_388046.htm。
- Zhongguo zhengfu wang (2006, September 13). Guojia “shiyiwu” shiqi wenhua fazhan guihua gangyao. Retrieved from http://www.gov.cn/jrzg/2006-09/13/content_388046.htm.
- 中國政府網(2012年2月15日)。**〈中辦國辦印發國家「十二五」文化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取自 http://www.gov.cn/jrzg/2012-02/15/content_2067781.htm。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0期(2022)

- Zhongguo zhengfu wang (2012, February 15). Zhongban Guoban yinfa guojia "shierwu" wenhua gaige fazhan guihua gangyao. Retrieved from http://www.gov.cn/jrzg/2012-02/15/content_2067781.htm.
- 王嬌萍(2011年10月18日)。〈工人文化宮改革20週年沉思錄〉。取自 <http://acftu.workercn.cn/c/2011/10/18/111018073217515448244.html>。
- Wang Jiaoping (2011, October 18). Gongren wenhuagong gaige 20 zhounian chensi lu. Retrieved from <http://acftu.workercn.cn/c/2011/10/18/111018073217515448244.html>.
- 王洪喆(2015年12月9日)。〈工人文化宮、中國東北與20世紀的文化政治〉。《中華讀書報》，第13版。
- Wang Hongzhe (2015, December 9). Gongren wenhuagong, Zhongguo dongbei yu 20 shiji de wenhua zhengzhi. *Zhonghua dushubao*, p. 13.
- 王洪喆、邱林川(2015)。〈空間、科技、與聲音：新老工人階級文化空間的比較研究〉。《傳播文化與政治》，第2期，頁27-60。
- Wang Hongzhe, Qiu Lincuan (2015). Kongjian, keji, yu shengyin: Xinlao gongren jieji wenhua kongjian de bijiao yanjiu. *Chuanbo wenhua yu zhengzhi*, 2, 27-60.
- 北京市檔案館(1950)。〈關於抗美援朝的指示和政治、文化教育實施辦法及文化宮的門票問題向市委、全總的請示批復〉。檔案號：J101-001-00296。
- Beijing shi dangan guan (1950). Guanyu kangMei yuanChao de zhishi he zhengzhi, wenhua jiaoyu shishi banfa ji Wenhuagong de menpiao wenti xiang Shiwei, Quanzong de qingshi pifu. Dangan hao: J101-001-00296.
- 北京市檔案館(1961)。〈北京誌文化館部分〉。檔案號：J001-012-00870。
- Beijing shi dangan guan (1961). Beijing zhi wenhua guan bufen. Dangan hao: J001-012-00870.
- 全國地方工人文化宮、俱樂部情況調查組(2011)。〈工人文化宮、俱樂部是職工文化建設的重要載體〉。《中國職工教育》，第2期，頁30-31。
- Quanguo difang gongren wenhuagong, julebu qingkuang diaocha zu (2011). Gongren wenhuagong, julebu shi zhigong wenhua jianshe de zhongyao zaiti. *Zhongguo zhigong jiaoyu*, 2, 30-31.
- 李維平、熊開達(2000年1月12日)。〈全總慰問團為下崗職工送溫暖〉。《人民日報》，第3版。
- Li Weiping, Xiong Kaida (2000, January 12). Quanzong weiwen tuan wei xiagang zhigong song wennuan. *Renmin ribao*, p. 3.
- 李紅濤、黃順銘(2017)。《記憶的紋理：媒介、創傷與南京大屠殺》。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Li Hongtao, Huang Shunming (2017). *Jiyi de wenli: Meijie, chuangshang yu Nanjing datusha*.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 呂新雨 (2004)。〈《鐵西區》：歷史與階級意識〉。《讀書》，第1期，頁3-15。
- Lü Xinyu (2004). *Tiexiqu: Lishi yu jieji yishi. Dushu, 1*, 3-15.
- 吳理財、解勝利 (2019)。〈中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40年：理念演進、邏輯變遷、實踐成效〉。《上海行政學院學報》，第5期，頁100-111。
- Wu Licai, Xie Shengli (2019). Zhongguo gonggong wenhua fuwu tixi jianshe 40 nian: Linian yanjin, luoji bianqian, shijian chengxiao. *Shanghai xingzheng xueyuan xuebao, 5*, 100-111.
- 周立權 (2010年7月16日)。〈蒲縣億元文化宮引發爭議〉。《人民日報》，第12版。
- Zhou Liquan (2010, July 16). Puxian yiyuan wenhuagong yinfa zhengyi. *Renmin ribao*, p. 12.
- 周海燕 (2013)。《記憶的政治》。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
- Zhou Haiyan (2013). *Jiyi de zhengzhi*. Beijing: Zhongguo fazhan chubanshe.
- 陳韜文、李立峯 (2010)。〈香港不能忘記六四之謎：傳媒、社會組織、民族國家和集體記憶〉。《新聞學研究》，第103期，頁215-259。
- Chen Taowen, Li Lifeng (2010). Xianggang buneng wangji liusi zhi mi: Chuanmei, shehui zuzhi, minzu guojia he jiti jiyi. *Xinwen xue yanjiu, 103*, 215-259.
- 陳振華 (2016)。〈集體記憶研究的傳播學取向〉。《國際新聞界》，第4期，頁109-126。
- Chen Zhenhua (2016). Jiti jiyi yanjiu de chuanbo xue quxiang. *Guoji xinwenjie, 4*, 109-126.
- 梁澤楚 (1989)。《群眾文化史》。北京：新華出版社。
- Liang Zechu (1989). *Qunzhong wenhua shi*. Beijing: Xinhua chubanshe.
- 曹玲娟 (2014年5月2日)。〈上海農民工免費看電影〉。《人民日報》，第4版。
- Cao Lingjuan (2014, May 2). Shanghai nongmingong mianfei kan dianying. *Renmin ribao*, p. 4.
- 馮象 (2014)。〈國歌賦予自由〉。《北大法律評論》，第1期，頁234-245。
- Feng Xiang (2014). Guoge fuyu ziyou. *Beida falü pinglun, 1*, 234-245.
- 趙月枝、吳暢暢 (2016)。〈網絡時代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的重建？——國家、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政治傳播〉。《開放時代》，第1期，頁118-140。
- Zhao Yuezhi, Wu Changchang (2016). Wangluo shidai shehui zhuyi wenhua lingdao quan de chongjian?—Guojia, zhishi fenzi yu gongren jieji zhengzhi chuanbo. *Kaifang shidai, 1*, 118-140.
- 潘毅、陳敬慈 (2008)。〈階級話語的消逝〉。《開放時代》，第5期，頁3-60。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0期(2022)

- Pan Yi, Chen Jingci (2008). Jieji huayu de xiaoshi. *Kaifang shidai*, 5, 3–60.
- 劉宇 (2013)。〈娛樂與革命——1950–1966年的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宮〉。《江蘇社會科學》，第5期，頁163–169。
- Liu Yu (2013). Yule yu geming—1950–1966 nian de Beijingshi Laodongrenmin wenhuagong. *Jiangsu shehui kexue*, 5, 163–169.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Fairclough, N. (1995).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Boston, MA: Addison Wesley.
- Fairclough, N. (2010).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London, UK: Longman.
- Foucault, M. (1977).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albwachs, M. (1980). *The collective memory* (J. D. Francis & Y. D. Vida, Trans.).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 Hatch, J. (1994). Hangouts and hangovers: State, class and culture in Moscow's Workers' Club movement, 1925–1928. *Russian Review*, 53(1), 97–117.
- Hung, C. T. (2013). A political park: The Working People's Cultural Palace in Beij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8(3), 556–577.
- Lee, C. K. (2000). The “revenge of history”: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labor protests in north-eastern China. *Ethnography*, 1(2), 217–237.
- Lee, C. K. (2002). From the specter of Mao to the spirit of the law: Labor insurgency in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31(2), 189–228.
- Lee, C. K. (2007a). What was socialism to Chinese workers?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labor politics in an age of reform. In C. K. Lee & G. Yang (Eds.), *Re-envision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collective memories in reform China* (pp. 141–16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e, C. K. (2007b).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e, C. K., & Yang, G. (Eds.). (2007). *Re-envision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collective memories in reform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febvre, H. (1979). Space: Social product and use value. In J. W. Freiberg (Ed.), *Critical sociology: European perspective* (pp. 285–295). New York: Irvington.
- Liu, Q., & Ouyang, H. (2016). The recontextualization of revolutionary symbolic capital in Chinese online grassroots discourse. *Discourse & Society*, 27(5), 500–515.
- Ngai, P. (2005).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從「工人文化」到「公共文化」

- Nora, P. (1989).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e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7–24.
- Olick, J. K. (2008). Collective memory: A memoir and prospect. *Memory Studies*, 1(1), 23–29.
- Siegelbaum, L. H. (1999). The shaping of Soviet workers' leisure: Workers' Clubs and Palaces of Culture in the 1930s.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56, 78–92.
- Williams, R. (2015).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dak, R. (2001).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pp. 63–94). London: Sage.
- Xing, G. (2010). Urban workers' leisure culture and the “public sphere”: A stud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ers' Cultural Palace in reform-era China. *Critical Sociology*, 37(6), 817–835.

本文引用格式

路焱 (2022)。〈從「工人文化」到「公共文化」：工人文化宮國家記憶之流變 (1949–2015)〉。《傳播與社會學刊》，第60期，頁157–183。